

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

黃一農

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研究，不僅能對明清鼎革的時代背景有一更清晰的了解，也可幫助我們對兩個不同文化交會時所出現的調和與衝突，有一更深層的體認與省思。

本文即嘗試對此一領域先前的研究成果做一回顧與分析，尤其偏重於檢討我國學界過去的研究方向與方法。文中也對相關原始文獻的收藏狀況，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途徑有所論述。

關鍵詞：天主教傳華史 明末清初 史學史

一、前言

明末，天主教文化隨著歐洲國家的海權擴張而東漸，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等耶穌會士(Jesuits)即遠來中國宣教，希冀能扳回天主教在新教興起後，於歐洲所喪失的廣大勢力範圍。他們為順應當時中國知識界欲救弊振衰、濟世致用的實學思潮，乃積極傳入西方較進步的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火器、曆算和器用之學，並成功地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注意¹，徐光啓、楊廷筠和李之藻等士大夫更進而領洗奉教²。

崇禎二年(1629)，徐光啓奉旨成立曆局，率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ò, 1565-1655)和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等西士在明廷中推行改曆運動³。雖然西法在明朝屢遭保守勢力的排擠，而不及頒行，且徐光啓、孫元化等奉教人士利用西洋火器所從事的軍事改革，也因孔有德所掀起的吳橋兵變，不幸以失敗告終⁴，但在滿人新入主中原之際，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終於適時地把握此一難得的契機，擺脫前朝利益團體和保守人士的阻撓，而奉命掌理欽天監⁵。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於是在迭受恩榮的湯若望的蔭庇之下達到巔峰⁶。

筆者感謝臺灣大學的李東華教授和古偉瀛教授、東海大學的林東陽教授、荷蘭萊頓(Leiden)大學的杜鼎革(Adrianus Dudink)博士以及比利時魯汶(Leuven)大學的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或資料。

¹如見拙文，〈明末中西文化之衝突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為例〉，曾於1995年5月在臺北臺灣大學所主辦之「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世變、群體與個人」上宣讀。

²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朱鴻林，〈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成為天主教徒試釋〉，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477-497。

³Keizo Hashimoto, *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Osaka, Japan: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7-73.

⁴拙文，〈孫元化——落實徐光啓軍事改革政策的一位天主教徒〉，將發表於1995年3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Xu Guangqi (1562-1633): Chinese Scholar and Statesman」會議論文集上。

⁵拙文，〈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吳嘉麗、葉鴻瀾主編，《新編中國科技史》下冊(臺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465-490。

⁶拙文，〈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42-60。

從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於萬曆十年(1582)在廣東肇慶首建耶穌會的會院起，天主教雖然吸引了不少中國的仕紳和百姓領洗，但它也和深受儒、釋兩家思想影響的許多中國人士，因彼此對己方文化的主觀態度和對它方文化的不了解，而產生嚴重爭執，如萬曆年間有「南京教案」⁷、康熙初年有「曆獄」⁸，致使在華教會頗受打擊。

此外，自明末以來即萌生的「禮儀之爭」，更是影響深遠，此一綿亙逾百年的事件，不僅牽涉到中西文化間的衝突，更由於不同傳教會間的摩擦、歐洲各海上強權間的對抗以及教廷傳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對保教權(Padroado or Patronato Real)的制衡等因素，而令此事的演變更形複雜。當時天主教內對中國社會祭祖祭孔的行為和部分教友以「天」和「上帝」稱呼天主的作法，意見非常分歧，而在十七、八世紀之交，甚至因此引起康熙皇帝和羅馬教廷間的衝突，並令天主教招致被禁的命運⁹。

⁷張維華，〈南京教案始末〉，收入氏著《晚學齋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6)，頁493-519，原發表於《齊大月刊》1：2/3(1930)；Erik Zürcher, "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Nanking 1616-1621)," in P. W. Pestman ed., *Acta Orientalia Neerlandica: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Dutch Oriental Society Held in Leiden on the Occasion of Its Fiftieth Anniversary* (Leiden, Netherland: Leiden University, 1971), pp. 188-195.

⁸拙文，〈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新21：2(1991)，頁247-280；日文本篇名為〈択日の争いと「康熙曆獄」〉，伊東貴之翻譯，《中國——社會と文化》6(1991)，頁174-203；英文本篇名為"Court Divination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K'ang-Hsi Era," 席文(Nathan Sivin)翻譯，《Chinese Science》10(1991)，pp. 1-20。

⁹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臺中：光啓出版社，1961)，頁83-186；矢沢利彦，《中國とキリスト教》(東京：近藤出版社，1972)，頁1-297；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76.

由於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被稱作「天崩地解」的時代，無論在政治、社會、思想各方面均出現極大的變動，而中、歐兩大文明的大規模接觸，又正好發生在同一時空，故從事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研究¹⁰，不僅能對明清鼎革的時代背景有一更清晰的了解，我們更有機會將一原本屬於中國史的領域，置於世界史的框架，探討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政經衝突和思想變遷對其傳教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並析究歐洲的海權擴張以及天主教會在亞洲其它地區的發展，又如何影響及在華的傳教活動。此外，透過此一中西文化首度大規模接觸的個案，也可幫助我們對兩種不同文化交會時所出現的調和與衝突，有一更深層的體認與省思。

二、先前研究成果的回顧與比較

筆者根據個人過眼的文獻，再參酌以《東洋學文獻類目》(1963-1990)、《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ca. 1680)等書所匯集的資料¹¹，整理出近數十年間臺灣、大陸、歐美和日本等地學者所出版的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專

¹⁰ 筆者將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所處理的時段，姑且定義為西元1552-1717年間，亦即起自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 1506-1552)於嘉靖三十一年登陸廣東沿海的上川島，迄於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於康熙五十六年疏請禁教獲准；參見《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七二，頁5-6。

¹¹ 《東洋學文獻類目》(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查時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中日文專著與論文目錄》(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1)；Erik Zürcher, Nicolas Standaert & Adrianus Dudink eds.,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ca. 1680)(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1991).

書或論文集(參見表一至四)。雖然限於學力和取捨條件的不一致，必然有許多缺漏，但或已可相當程度地反映出此一領域的主要學術動態。

談到先前中國學者在天主教傳華史上的研究，一定會提及陳垣(1880-1971)的貢獻。陳氏自從一九一八年出版〈元也里可溫考〉之後，開始在宗教史界嶄露頭角。一九四三年，北平輔仁大學出版由其門人葉德祿所輯印的《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叢》一書，即收錄陳垣的十六篇相關論文，佔該書總篇數的十分之八，此或為民國成立以來的前三十年間，個別中國學者在天主教傳華史領域上整體水準最高的研究成果¹²，其中尤以他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所撰一系列有關吳歷的論文以及〈湯若望與木陳忞〉(1938)一文最具學術價值，前者充分利用了書畫題跋和詩文別集中的資料，後者則融合了他在佛教史和天主教史研究中所積累的深厚功力。

陳垣雖曾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領洗入基督教，然或因其置有二妾，嚴重違反十誡的教規，故一直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曾入基督教，也未在其北平輔仁大學校長任內(1926-52)改信天主教¹³。陳垣有關天主教史的重要論著幾乎都完成於其執掌輔大期間，且主題大多環繞在人物之上，如他試圖透過傳教士湯若望所受的優遇，士大夫王徵、金聲和陳于階等人的殉國事跡，知名畫家吳歷的藝術成就，以及宗人蘇努和德沛的身份地位等角度，以揚舉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的突出發展，並在抗戰期間借題發揮自己「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心境，此亦

¹²其他學者的研究概況，可參見方豪，〈六十年來之中西交通史〉，《華學月刊》25(1974)，頁31-46。其中部分重要的著述，可見於包遵彭等編，《中西文化交流》，收入《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2冊(臺北：正中書局，1956)；陳受頤，〈《中歐文化交流史事論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¹³謝扶雅，〈陳援菴受洗入教問題——五四時代自由氣氛中的一個插曲〉，《傳記文學》22：5(1973)，頁20-36。筆者感謝鄭鳳凰小姐提供此一資料。

即陳垣當時所提倡「有意義之史學」的具體產物¹⁴。因而在陳氏的字裡行間屢可見濃厚的揚教心態，無怪乎天主教學者方豪(1911-1980)在拜讀他所撰的〈休寧金聲傳〉(1927)和〈涇陽王徵傳〉(1934)後，嘗謂其文曰：「考古彌精，崇論彌闢，洵足光輝基督，推倒陋儒」¹⁵。

陳垣自一九四一年以後即不再有關於天主教史的重要作品發表。一九四九年，陳垣在北平的中共政權下當選政協特邀委員¹⁶，從此，他在言行和學術上均逐漸與天主教劃清界線¹⁷。一九五二年，輔仁大學與師範大學合併為北京師範大學，陳垣被任命為校長。一九五九年，陳垣終於成為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員，且公開宣稱：「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歸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卻是年八十而知七十九年之非」。一九六二年，陳垣計劃將先前所編寫的〈吳漁山年譜〉(1937)增訂後出書，並擬將〈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1936)一文收入，雖因故未果，但他卻將後文改名為〈吳漁山生平〉¹⁸，其原因或以「晉鐸」一詞所呈現的天主教味道太濃所致。

陳垣晚年雖不再治天主教史，然而自稱為其私淑弟子的方豪¹⁹，則承繼並發揚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方豪出身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自

¹⁴方豪，〈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牘稿(二)〉，《傳記文學》20：4(1972)，頁44-54。

¹⁵參見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87-288。

¹⁶後文中有關陳垣的生平事跡，如未另加說明，均請參閱王明澤，〈陳垣事跡著作編年〉，收入《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454-528。

¹⁷遼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115-133。

¹⁸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29-258、276-327。

¹⁹此見方豪，〈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牘稿(一)〉，《傳記文學》19：5(1971)，頁59-66。此外，有關方氏學術的討論與回顧，請參見李東華，〈懷援菴

一九二六年起即透過通信與陳垣論學，前後長達二十年之久²⁰。四〇年代，方豪先後出版《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和《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三本論文集，奠定其在天主教傳華史學界的地位，陳垣因而嘗贊其曰：「公教論文，學人久不置目，足下孤軍深入，一鳴驚人，天學中興，舍君莫屬矣！」²¹

做為一位天主教司鐸，方豪或有更多機會見到教會機構所藏的天主教史料，故在其論文集中，對相關文獻的介紹和考校即明顯佔了相當比例。此外，由於神職人員養成教育的要求再加上自修的努力，使方豪得以充分掌握和運用拉丁文和法文等外文材料，此更是陳垣等先前中國學者所不及的。

中共政權成立初期，大陸學界一直缺乏後起之秀從事相關研究，僅任教於北京大學的朱謙之(1899-1972)等少數學者仍致力於此。朱氏對西方文獻的掌握，與方豪不遑多讓，他原以《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北平：商務印書館，1940)一書，享有盛譽，一九六二年，朱氏將此書增訂並改名為《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惟因各種因素的影響，此書在稿成後二十餘年始得出版。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學界更視此一領域為禁區，除了一九六九年中

與亮塵，念覺明與杰人——略論民國以來國人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收入《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1992)，頁901-914；李東華，〈方杰人(豪)先生年譜稿〉，《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4(1985)，頁1-72。

²⁰如在現存陳垣的往來信件中，方豪即以三十九通在兩百多人中排行第七位，且無人當與陳垣討論天主教傳華史的深度或廣度超乎方豪。參見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頁278-310。

²¹方豪，〈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牘稿(續完)〉，《傳記文學》20：5(1972)，頁77-84。

俄珍寶島邊境衝突之後，所曾引發部分學者對入華耶穌會士在尼布楚談判時所扮演角色的興趣外，少有人願觸及此類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相對地，一九四九年移居臺灣的方豪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五冊本的《中西交通史》²²，一九六六年出版《李之藻研究》，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出版《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中、下三冊，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間更陸續將先前所發表的單篇論文結集為《方豪六十自定稿》和《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出版，成果相當豐碩。其中尤以《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最具影響力，此與費賴之(Louis Pfister)所編輯的*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Shanghai: Mission Catholique, 1932-1934)以及榮振華(Joseph Dehergne)所編輯的*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二書，均仍為目前相關領域研究者必備的參考工具書。至於其在《方豪六十自定稿》等論文集集中所收的許多著述，也還屢被學界中人引用。方氏原本起意撰寫一本天主教傳華的通史，惜未能如願。但總結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民國以來治天主教史的中國學者當中，應尚無人能出其右，其貢獻也應超乎其師陳垣之上，無怪乎師承陳垣的牟潤孫嘗謂其為「新會學案第一傳人」²³。

對於天主教文獻的重新景印出版，亦為過去幾十年來臺灣學界的重要貢獻之一，其中尤以天主教學者吳相湘負責編輯的《天學初函》和《天主教東傳文獻》(一至三編)最具價值。《天學初函》原由李之藻

²²此書僅第四和第五兩冊涉及明末至清代中葉的時段，故此二冊又名「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又，後文中所提及的各書，如未註明出版資料，均請參閱表一至表四。

²³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菴先生〉，《明報月刊》1971年10月號，頁15-19。案：陳垣為廣東新會人。

在崇禎元年所刊刻，此次重印乃據羅光所代管的原金陵大學藏本影印，至於《天主教東傳文獻》，則是在羅光、趙雲崑、方豪、顧保鵬等教會人士的協助之下，將現藏歐洲的四十種重要原典影印而成，方豪並嘗為其中的二十種作序。

事實上，臺灣學界先前在此一領域的發展，頗受益於奉教人士的推動與參與，如表一中所臚列的各書，即有半數是由與教會相關的單位(如光啓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聞道出版社、香港公教真理學會、高雄教區主教公署等)所出版，而其中逾五分之三的書也是由神父或教友(如羅光、方豪、張奉箴、羅漁、鄭天祥和吳湘等)所編寫。

在過去五十年間，臺灣地區的學者雖然出版了近三十冊的專書或論文集(見表一)，但其中有許多並未能在新史料的開發或問題的見解上有重要的創獲。尤其在方豪於一九八〇年過世之後，臺灣史學界對此一領域的研究明顯步入下坡，甚至出現斷層。

近些年來，此一情形雖稍見好轉，但中生代學者中專門從事相關研究者仍然不多，只有古偉瀛、查時傑、林東陽、張永堂、張增信和筆者等數人較致力於此，其中古氏以研究南懷仁為主²⁴，查氏的研究以明末佛教與天主教間的衝突及北京地區教會古蹟的沿革為主²⁵，林

²⁴如見古偉瀛，〈朝廷與教會之間——中國天主教史中的南懷仁〉，收入輔仁大學歷史系所主編，《慶祝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中西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161-202；Ku Weiying,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Church: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Catholic History of China," in John W. Witek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Nettetal, Germany: Steyler Verlag, 1994), pp. 329-347.

²⁵如見查時傑，〈明末佛教對天主教的「關邪運動」初探〉，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共同學科，1990)，頁485-529；查時傑，〈湯若望與北京南堂〉，《國立臺灣大學歷

氏的研究以清初受西學影響的地理學及親天主教士人馮應京的生平事跡為主²⁶，張永堂氏以研究曾接觸西學的方以智、熊明遇、游藝等人的思想為主²⁷，張增信氏致力於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²⁸，筆者的

史學系學報》17(1992)，頁1-28；查時傑，〈南堂與耶穌會公墓——與湯若望有關的北京兩處天主教建築〉，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61-87；查時傑，〈利瑪竇與北京耶穌會公墓〉，收入《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363-394。

²⁶ 如見 Lin Tong-Yang, *Études sur l'introduction des méthodes et des connaissances géographiques européennes en Chine (1583-1718)* (Paris: University of Paris, Sorbonne, 1982, Ph. D. thesis)；林東陽，〈明末西方宗教文化初傳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馮應京〉，收入《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1-257；林東陽，〈楊光先及其反教事件〉，收入《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79-212；Lin Tong-Yang, "Aperçu sur la mappemonde de Ferdinand Verbiest le K'un-Yü-Ch'üan-T'u," in Edward J. Malatesta and Yves Raguin eds., *Succès et Échecs de la rencontre Chine et occident du XVI^e au XX^e siècle*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3), pp. 145-173; Lin Tong-Yang, "Ferdinand Verbies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graphy,"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pp. 135-164.

²⁷ 如見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明末理學與科學關係試論〉（臺北：文鏡文化事業公司，1987）；張永堂，〈明末清初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²⁸ 張增信所出版的《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雖原為其碩士論文，然因他博採英、日、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文的史料，並曾親身往勘相關地點，故其視野較為寬廣。惜其在此書之後，有關此一領域的著作並不多。

則主要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對西學西教的態度以及「康熙曆獄」和「禮儀之爭」的背景、過程與影響²⁹。

至於香港地區，雖然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一直不多，然而楊意龍(John D. Young)所撰寫的 *East-West Synthesis: Matteo Ricci and Confucianis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和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李弘祺(Thomas Lee)所主編的會議論文集 *China and Europ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譚志成(Laurence C. S. Tam)為「清初六家與吳歷」展覽所編撰的 *Six Masters of Early Qing and Wu Li*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86)等書，水準均頗高，惟其中李弘祺現已移居美國。此外，據筆者所知，香港地區現還有中文大學的馮錦榮等青年學者以此為研究專業³⁰。

一九八〇年之後，大陸學界因受「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投入者漸多，迄今已有二十本左右編撰或翻譯的書籍出版，成果可說相當豐碩。在這些著述中，尤以最近三年間出版的數本討論明清之際中西科學或文化之交流與衝突的專書，最為突出，作者均試圖走出文革時排外心態的陰影，對明末清初中西間的文明接觸做一重新的評價，此一研究傾向在一九八〇年以來的許多單篇論文中亦可清楚看到(參見表五)。然而一般說來，現今大陸學者對境外的研究成果多頗為陌生，且

²⁹ 筆者先前曾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近三十篇相關論文，目錄從略。

³⁰ 馮錦榮主要的著作有：〈明末清初方氏學派之成立及其主張〉，收入山田慶兒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頁139-219；〈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收入《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3)，頁117-135。

除了福建師範大學的林金水等少數人之外³¹，在原始文獻的掌握上亦嫌不足。

倒是服務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耿昇，近年來一直努力於譯介法國學界的相關研究，嘗撰有〈法國近年來對入華耶穌會士問題的研究〉和〈法國學者近年來對中學西漸的研究(專著部分)〉等文³²，也曾翻譯出版《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Chine et Christianisme*以及榮振華的*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等書³³，其中前書乃為譯者自行挑選的論文集，共有十四篇涵蓋各領域的相關著述。此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對中國學者的助益頗大，應給予熱烈的鼓勵。

歐美學界相關的研究論著十分豐富，許理和(Erik Zürcher)、鐘鳴旦和杜鼎革三人所編輯的*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1580-ca.1680)一書，整理出一九九〇年之前一世紀間以歐文(不含蘇俄和東歐語言)發表的論文和書籍，總數逾一千篇(或本)。此一目錄對掌握西方學者的研究幫助甚大，可惜其中相當多的期刊和書籍，均不易在臺

³¹ 林金水主要的著作有：〈利瑪竇在中國的活動與影響〉，《歷史研究》1983：1，頁25-36；〈利瑪竇在廣東〉，《文史》20(1983)，頁147-161；〈利瑪竇輸入地圖學說的影響與意義〉，《文史哲》1985：5，頁28-34；〈《易經》傳入西方考略〉，《文史》29(1988)，頁365-383；〈利瑪竇交游人物考〉，收入《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117-143；〈試論南懷仁對康熙天主教政策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91：1，頁54-67；〈艾儒略與明末福州社會〉，《海交史研究》1992：2，頁56-66、99；〈明清之際士大夫與中西禮儀之爭〉，《歷史研究》1993：2，頁20-37。

³² 前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87：3，頁20-27。後文亦見於同一刊物1995：4-6。

³³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正文中有部分書籍未曾註明出版時地，均請參閱表一至四。

灣或大陸見到。據筆者粗估，海峽兩岸學者在過去五十年間，以中文撰寫的相關論文，也約有五百篇之譜，似亦應仿照此書整理出一目錄，以供學界參考³⁴。

筆者在表三中列出大約五十本歐美學者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四年間所出版的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書目，由於資訊不夠流通，再加上筆者學力的寡陋，此表肯定相當不完整。但即使從目前整理出的資料，我們也可清楚發現西方漢學界在此一領域所積累的成就，遠超過中國學界。此或因在西方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之下，他們的問題意識均相當強，加上他們較易掌握以歐文撰寫的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文獻，且易於運用現藏在歐洲的大量中文原典所致。

歐洲學界現有一跨國的研究群正進行一名為「Europe and China」的計劃，由謝和耐、許理和等人領導，成員包含法國、荷蘭、德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約二十位學者，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討論會，探討以十六、七世紀為主的中、歐關係史。此外，從一九七四年起，每隔三年在法國Chantilly所舉辦的國際漢學會議，其研討的內容也多與此一領域相近³⁵。

荷蘭萊頓大學的漢學院，一直以明末清初中、歐文明交流史為發展重點之一，該校圖書館相關的收藏相當豐富，且在許理和的領導之下，該校也為此一領域培育出許多一流人才，如鐘鳴旦、杜鼎革等學者均在此獲得博士學位。

德國的「華裔學志研究所(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以及比利時的「南懷仁基金會(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同屬教會支持的學術機構，

³⁴ 查時傑所編纂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書目——中日文專著與論文目錄》一書，因完成較早，故未包括近十五年的作品，且因當時海峽兩岸資訊的隔絕，該書也未曾收錄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學者的著作。

³⁵ 此一會議的主題，現正漸漸轉為關注十九世紀的中、歐文明交流史。

他們曾出版不少相關的論著，也曾舉辦過紀念湯若望、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耶穌會士的國際會議，貢獻頗多。

美國從事相關研究的個別學者亦不少，但較少形成研究群或組織定期之研討會。然而由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所主編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雜誌(*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³⁶，則為目前此一學門唯一的專業期刊，每期除刊載兩篇左右的論文外，亦介紹學界的相關活動與出版物，該刊的篇幅雖不厚，但對此一學門的貢獻頗大，且亦接受中、英、法、德和西班牙等國語文的投稿。而由芝加哥大學的Donald F. Lach 所編纂的大部頭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1965-)，更是成就斐然，現已出版三卷，凡九冊，極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對歐洲所產生影響的程度。

由馬愛德(Edward J. Malatesta)神父所領導的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設於舊金山大學內，近年也頗為活躍，曾將一百件涉及中國禮儀之爭的教廷文獻編譯出版，也曾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過一次紀念中國禮儀之爭的國際會議。

至於日本學界，則或因對日本天主教史的研究較有興趣(該領域現存的史料甚豐，且牽扯也十分複雜)，故有關天主教傳華史的著作並不多，其中以矢沢利彦的成果最多，他且將許多重要的歐文原始文獻翻譯成日文(參見表四)。

³⁶該刊原名*China Mission Studies(1500-1800) Bulletin*，中文名為《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乃為年刊，創始於一九七九年。

表一：臺灣地區學者於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四年間所出版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專書和論文集

編撰譯者	出版年	書名	出版者
方豪撰	1953	中西交通史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羅光撰	1953	徐光啓傳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羅光撰	1960	利瑪竇傳	光啓出版社
羅光撰	1961	教廷與中國使節史	光啓出版社
吳相湘編	1964	天學初函	臺灣學生書局
吳相湘編	1965-66	天主教東傳文獻(一至三編)	臺灣學生書局
王萍撰	1966	西方曆算學之輸入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方豪撰	1966	李之藻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
馮作民譯	1966	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	光啓出版社
羅光編	1967	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	光啓出版社等
方豪撰	1967-73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光啓出版社等
方豪撰	1969	方豪六十自定稿	方豪
方豪撰	1970	六十他定稿	雲天出版社
張奉箴撰	1970-71	福音流傳中國史略	輔仁大學出版社
鄭天祥編	1973	羅文藻史集	高雄教區主教公署
方豪撰	1974	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	臺灣學生書局
王漪撰	1979	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 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 議論文集	輔仁大學出版社
張奉箴撰	1983	利瑪竇在中國	聞道出版社
劉敏元撰	1983	明末清初西洋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	精華出版社
羅漁譯	1986	利瑪竇全集	輔仁大學出版社等

	1987	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輔仁大學出版社
張永堂撰	1987	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明末理學與科學關係試論	文鏡文化事業公司
張增信撰	1988	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	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計文德撰	1991	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	漢美圖書有限公司
	1992	歷史與宗教——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輔仁大學出版社
張奉箴撰	1992	羅公文藻晉牧三百週年紀念	聞道出版社
李佩華等譯	1994	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	石頭出版公司
張永堂撰	1994	明末清初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	臺灣學生書局

表二：大陸地區學者於一九四九至一九九四年間所出版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專書和論文集

編撰譯者	出版年	書名	出版者
	1964	徐光啓誕生四百周年紀念 論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
王立人譯	1973	耶穌會士徐日昇關於中俄 尼布楚談判的日記	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霞飛譯	1973	張誠日記	北京商務印書館
北京師範 學院譯	1980	俄國使節團使華筆記	北京商務印書館
梁家勉編	1981	徐光啓年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維華撰	1982	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徐光啓著譯集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朱謙之撰	1983	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	福建人民出版社
何高濟等	1983	利瑪竇中國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
王重民編	1984	徐光啓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席澤宗、吳 德鐸編	1986	徐光啓研究論文集	上海學林出版社
李之勤編	1987	王徵遺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張維華撰	1987	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	濟南齊魯書社
姚楠、錢江 譯	1988	中葡早期通商史	香港中華書局
于碩等譯	1989	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	遼寧人民出版社
白莉民撰	1989	西學東漸與明清之際教育 思潮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郝建恆等 譯	1989	歷史文獻補編——十七世 紀中俄文件選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民聲、孟 憲章編	1989	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 流域編年史	北京中華書局
宋伯胤編	1990	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孫尙揚、王麗麗譯	1991	利瑪竇的記憶之宮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耿昇譯	1991	中國和基督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亞寧撰	1992	明清之際之科學、文化與社會——十七、十八世紀中西文化關係引論	四川大學出版社
孫尙揚撰	1992	明末天主教與儒學的交流和衝突	台北文津出版社
陳衛平撰	1992	第一頁與胚胎——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比較	上海人民出版社
樊洪業撰	1992	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孫尙揚撰	1993	利瑪竇與徐光啓	北京新華出版社
許明龍撰	1993	中西文化交流先驅	北京東方出版社
管震湖譯	1993	利瑪竇評傳	北京商務印書館
耿昇譯	1993	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	成都巴蜀書社
林華等編	1994	歷史遺痕——利瑪竇及明清西方傳教士墓地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表三：歐美學者於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四年間所出版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重要專書和論文集

作者	書名	出版者(出版年)
Boxer, C. 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Hakluyt Society (1953)
Cary-elwes, C.	China and the Cross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Rouleau, F. A.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59)
Sebe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61)
Cummins, J. S.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	The Hakluyt Society (1962)
Dunne, G. H.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Attwater, R.	Adam Schall: A Jesuit at the Court of China 1592-1666	Charles Birchall (1963)
Gonzalez, J. M.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Imprenta Juan Bravo (1964)
Ryan, T. F.	Jesuits in China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4)
Lach, 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Etiemble, R.	Les Jésuites de Chine. La querelle de rites (1552-1773)	René Julliard (1966)
Fu, Lo-sh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6)
Dehergne, J.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3)
Cooper, M.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Weatherhill (1974)

Allan, C. W.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Kelly and Walsh (1975)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vols. 1-5)	Les Belles Lettres &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76-1993)
Mungello, D. E.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ahill, J.	The Compelling Images: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Gernet, J.	Chine et Christianisme	Editions Gallimard (1982)
Witek, J. W.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82)
Blondeau, R. A.	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Lannoo (1983)
Melis, G.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Trento,Italy (1983)
Boxer, C. 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Heinemann (1984)
Nieuwenborgh, M.	Ferdinand Verbiest: Missionaris of Spion?	Uitgeverij Tabor (1984)
Spence, J.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4)
	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Insel Verlag (1985)
Collani, C.	P. Joachim Bouvet S. 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teyler Verlag (1985)
Minamiki, 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instra, M. H.	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 1583-1584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Rule, P. A.	K'ung-tzs or Confucius?	George Allen & Unwin (1986)
Lundbaek, K.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88)
Ronan, C. E. & Oh, B. B. C.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 in China, 1582-1773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Standaert, N.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E.J.Brill (1988)
Mungello, D. E.	Curious L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Spence, J. D.	The Question of Hu	Vintage Books (1989)
Bertuccioli, G.	Travels to Real and Imaginary Lands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Kyoto (1990)
Heyndrickx, J.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Steyler Verlag (1990)
Lundbaek, K.	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re, D. F.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2)
Chaves, J.	Singing of the Source, Nature and God i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Cummins, J. S.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Scolar Press (1993)
Golvers, N.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	Steyler Verlag (1993)

Jami, C. & Delahaye, H.	L'Europe en Chine	Collège de France (1993)
Struve, L. A.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uteil, J. P.	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Editions Arguments (1994)
Evora, M. H. & Lau Fong	Séculos XVI a XIX O Observatório Astronómico de Pequim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Menegon, E.	Un Solo Cielo, Giulio Aleni S.J.(1562-1649): geografia, arte, scienza, religione dall'Europa alla Cina	Grafo (1994)
Mungello, D. 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Steyler Verlag (1994)
Mungello, D. E.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4)
Ross, A. C.	A Vision Betrayed,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	Orbis Books (1994)
Witek, J. W.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	Steyler Verlag (1994)

表四：一九六三至一九九四年間日本學者所出版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的專書和論文集

作者	出版年	書名	出版者
矢沢利彦	1970	イエズス會士中國書簡集 ——康熙編	平凡社
矢沢利彦	1972	中國とキリスト教	近藤出版社
山本澄子	1972	中國キリスト教史研究	東京大學出版會
後藤基己	1979	明清思想とキリスト教	研文出版
矢沢利彦	1987	北京四天主堂物語	平河出版社
Hashimoto, K.	1988	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矢沢利彦	1990	西洋人の見た十六～十八 世紀の中國女性	東方書店
矢沢利彦	1992	西洋人の見た中國皇帝	東方書店
矢沢利彦	1993	西洋人の見た十六～十八 世紀の中國官僚	東方書店

表五：大陸學者所出版部分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之論文

作者	出版年	篇名	期刊名
陳申如、朱正誼	1980	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歷史作用	中國史研究
臧嶸	1981	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的評價	北方論叢
張維華、孫西	1985	十六世紀耶穌會在華傳教政策的演變	文史哲
陳靜	1986	論傳教士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傳播中的主導作用	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
劉建	1986	十六世紀天主教對華傳教政策的演變	世界宗教研究
張德明	1992	論十七世紀中國的開放傾向	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
何桂春	1992	關於明清耶穌會士在華活動評價的幾個問題	學術月刊
康志杰	1994	也談「關於明清耶穌會士在華活動評價的幾個問題」	學術月刊
黃啓臣	1994	明末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其文化效應	史學集刊

三、我國學界先前研究方向和方法的檢討

我國學界先前在治天主教傳華史時，明顯將研究焦點偏重於個別奉教人物之上，也因此對相關傳記的整理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由於早期治天主教傳華史的中國學者，多為教中人士(如黃伯祿、蕭靜山、馬良、方豪等)，其餘也多與天主教關係密切(如陳垣)，故其研究的結果往往受本身宗教熱情的影響，而出現濃厚的揚教心態，雖然其研究的成果十分豐碩，但有些時候卻也可能拘限了發展的視野以及判斷的客觀性。

如在抗日戰爭前後，民族主義思潮風起雲湧，明末許多忠臣烈士的志節因此備受推崇，以致如瞿式耜和金聲等曾與天主教有所接觸的殉明文臣，都被誤說成教徒，而焦璉等忠義武將，也在證據不十分確鑿的情形下，被懷疑曾奉教，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跡並因此激起熱烈的研究。相對地，另一位亦被疑為奉教人士的南明權臣丁魁楚(有謂其教名為路加)，則因德行敗壞且晚節不保，以致少有教中學者對其人其事做進一步的探討³⁷。

同樣在此一彰顯明末奉教人士忠節的心態之下，天主教徒韓霖(天啓元年[1621]舉人)和魏學濂(崇禎十六年進士，東林要角魏大中之子)投降李自成並出任要職一事，亦被有意曲解或淡化，甚至衍生出有兩同名韓霖(一為天主教徒，一降李自成)的說法³⁸。

先前學者也未能以一同情了解的態度，來面對當時許多奉教人士將天主教信仰儒家化的行為，如在「盡節」的道德標竿之下，孫元化

³⁷有關瞿式耜、金聲、焦璉和丁魁楚等人的事跡，詳見拙文，〈揚教心態與天主教傳華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屢被錯認為教徒為例〉，《清華學報》新24：3(1994)，頁269-295。

³⁸筆者將另文詳論韓霖和魏學濂投降李自成之事。

(登萊巡撫)、王徵(天啓二年進士)和陳于階(徐光啓外甥)等教徒，均曾出現自刎未遂或自殺殉國的舉動，然因此舉有違十誡的教規，故在教會中人所編的教史中，往往有意不言他們自殺之事，或逕自改稱為遇害，也有轉而質疑相關史料的可靠性者³⁹。至於王徵晚年發表〈祈請解罪啓稿〉一文，公開其因無嗣而在父命之下私娶妾一事(雖符合傳統孝道，卻違反十誡)，則被置於「知過能改」的層次，而不曾去探討其內心因融合中西文化所產生的激烈衝擊⁴⁰。

對於入清以來所陸續發生的反西學或西教的事件，先前學者也往往在未曾對這些爭執的內容(涉及術數和曆算)與背景(涉及政治環境和文化傳統)進行深入探究的情形下，即將事件的發生單純歸咎於國人「保守頑固」的心態，並視西學凌駕中學為一無需驗證的必然結果。

其實，這些衝突的責任歸屬十分錯綜複雜，如湯若望在順治初年為使欽天監天主教化，曾利用各種機會多方排擠和裁撤其他派別的天文家⁴¹，遭到革職的原回回秋官正吳明炫因此於順治十四年(1657)展開強烈反彈，疏控新法失天。吳明炫在此案中雖遭失敗，但由其中推驗水星伏見一事的分析，知新法當時所推確有可能與實際的天象不合，而湯若望在此一訟爭中的獲勝，亦多少得力於機運及其在政壇的人脈與地位⁴²。

³⁹ 參見拙文，〈明末中西文化之衝突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為例〉；拙文，〈孫元化——落實徐光啓軍事改革政策的一位天主教徒〉。

⁴⁰ 拙文，〈明末中西文化之衝突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為例〉。

⁴¹ 拙文，〈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新史學》2：2(1991)，頁75-108。

⁴² 拙文，〈清初天主教與回教天文家間的爭鬥〉，《九州學刊》5：3(1993)，頁47-69。

順治十五年，湯若望授意其在欽天監的下屬楊弘量疏告禮部誤譯皇子榮親王葬期一事，結果禮部自尙書恩格德以下共七名官員分別遭到革職解任等處分。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掀起「曆獄」，成功地將天主教的勢力排出欽天監，他除了充分利用鰲拜等輔政大臣當權的新政治環境之外，獲得先前曾與湯若望交手的吳明烜(明炫因避康熙皇帝之諱而改名)⁴³和恩格德的幕後協助，亦爲其獲勝的主因之一，然而這些政治背景和引發「曆獄」的導火線卻均爲先前學界所完全忽略⁴⁴。

康熙七年十一月起，南懷仁開始大肆攻擊吳明烜所推算的回回曆法，他並利用康熙皇帝扳倒鰲拜的時機，抨擊楊光先黨附鰲拜，終於將「曆獄」翻案，且以新法重獲欽天監的領導權。雖然當時西法的推步多較回回法或中法精密，但其實南懷仁所指斥回回曆所犯的「嚴重」舛誤，多因新曆所使用的定義不同所致。亦即舊曆與天行的誤差，遠不如南懷仁所渲染者大，且西法亦非果真如天主教天文家所宣稱的「吻合無差」，然而先前學者多在未細加推究的情形下，逕然採信耶穌會士著作中的單方面說辭⁴⁵。

對於康熙「曆獄」的主角楊光先⁴⁶，近代學者則多從現代的價值觀出發，視其爲一頑固的保守人士或「惡毒、聲名狼藉、唯利是圖的冒充內行者」，而不曾回到歷史的脈絡，對楊氏的行事給予一較公允、適切的評價，也不曾對有清末學者極稱楊光先乃「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的現象，進行一學術性的探討。

⁴³ 拙文，〈吳明炫與吳明烜——清初與西法相抗爭的一對回回天文家兄弟？〉，《大陸雜誌》84：4(1992)，頁1-5。

⁴⁴ 拙文，〈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

⁴⁵ 拙文，〈清初天主教與回教天文家間的爭鬥〉。

⁴⁶ 參見拙文，〈楊光先家世與生平考〉，《國立編譯館館刊》19：2(1990)，頁15-28。

以上所提及的許多研究盲點，因涉及較龐雜的中文文史資料以及較技術的天文術數知識，故也同樣為外國學者所忽略。

由於天主教傳華史的研究，不僅涉及中文的史料，且亦需處理多種語言的西文文獻，中、西文史料的辨讀、會通與解析，大大增加了此一學門在研究上的困難度。方豪嘗對西文資料的運用表示其看法，稱：

近年吾國學者論及明末清初國人信教者，必中西文均有史料可資證明，始肯採信。實則，中文史料，如屬可信，不必借助於西文史料；西文史料，如確為當時人記當時事，則必可信，亦無庸求證於中文史料也⁴⁷。

然而此一處理史料的態度或仍有商榷之處，因為遙遠的中國對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而言，仍籠罩著神祕的面紗，且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高度文明亦充塞著各種幻想與憧憬，以致當時所出版描寫中國情事的西文書籍，常未能信而有徵。即使是出自在華傳教士的著述，也往往因認識不足甚或為宣傳的目的，而有曲解或誤解事實的情形。故我們實在很有必要對照相關的中文文獻，以解析西文資料的可信度，而不應輕以當時西人所記的當時事，必為可信。

前述對瞿式耜等人宗教信仰的附會說法，即多是受到十七世紀西文紀述的誤導，部分學者常未遑細考相關的中文記載就逕自加以引用。而在外文資料獲得不易和解讀困難的情況下，先前學者也常因無從考證而掇引出處不詳或立論失當的二手中文著述。簡言之，中西史料的融通與辨讀，應仍是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的目標。

⁴⁷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286。

四、相關原始文獻的收藏狀況

資料為史學研究之根本。明末清初涉及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中文原始文獻，若寬鬆地定義，現或許尚有七、八百種留存，惟藏書地分散世界各國。臺灣地區相關的原典以輔仁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收藏最為豐富，其中包含大約兩百種原藏上海徐家匯書樓的與天主教史相關的文獻，而屬於明末清初者約九十種⁴⁸，但因該館為耶穌會的內部圖書館，故並未對一般讀者開放。據聞該館將於一九九五年年底請荷蘭學者杜鼎革來臺將該批書籍的目錄整理出來。筆者個人則擁有近三百種相關文獻，惟幾乎全數為國內外圖書館所藏原典的複印件。

大陸方面，原徐家匯藏書樓的收藏現已歸上海圖書館，但少有學者能獲准使用這些資料。徐宗澤在其出版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1949)中，曾附有四百多種徐家匯中文藏書的書目，其中除有八十種現藏輔大外，餘書很可能仍均留存在原處。至於徐家匯的歐文藏書，現則著錄在上海圖書館新近編輯的《上海圖書館西文珍本書目》(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中。北京的北堂圖書館也藏有大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攜入中國的歐文書籍，惟現也未全面對學術界開放。該堂的藏書目曾出版成*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Pékin: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49)一書。

在日本方面，吉田忠等人曾進行一研究計劃，調查該國各地的相關藏書，並於一九八八年整理發表《イエズス會士關係著譯書の基礎

⁴⁸此批書在國民政府撤離大陸之際，先由修會轉抵菲律賓，後再輾轉運送來臺，筆者曾由親預其事的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張奉箴神父處聽聞此事。至於該批書籍的現況，則由鐘鳴旦神父提供。

的研究》(此為其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臚列了百餘種書名和收藏處,但其中大部分均屬較易見的書籍或版本。

美國方面的相關藏書,則可參閱 Archie R. Crouch 所編輯的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89) 一書,惟其中明末清初的部分,數量並不太多。

至於歐洲各圖書館的相關收藏,則遠遠超過其他地區。Maurice Courant 曾於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二年間替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編纂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Paris: Ernest Leroux), 此一書目簡介了該館所收上萬種中、日、韓古籍的版本和內容,而其中涉及此一領域的原典即超過五百種,且不乏善本或孤本,有興趣的學者可向該館申購微捲。至於在羅馬地區的義大利國立中央圖書館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Vittorio Emanuele II)⁴⁹、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以及耶穌會檔案館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Jesu) 的收藏,也頗為可觀。

其中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文獻,曾由 Paul Pelliot 在一九二二年整理出一目錄,惟因故一直未能出版,據聞日本方面有意在近期內將該書刊行。而 Howard L. Goodman 近在 Anthony Grafton 所編輯的 *Rome Reborn: The Vatican Library and Renaissance Cultur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一書中,曾撰有一文介紹教廷圖書館所藏與明末清初在華天主教有關的文獻,文中並附有不少精彩的照片。法國學者

⁴⁹Battaglini, Marina, "The Jesuit Manuscripts Concerning China, Preserved in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Vittorio Emanuele II in Rome," in E. J. Malatesta & Y. Raguin eds., *Actes du 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3), pp. 35-75.

François de Gandt, 則曾於一九八五年對耶穌會檔案館中有關中國科學史的收藏, 做過初步的調查⁵⁰。

德國學者Hartmut Walravens於一九八二年將法國國家圖書館(根據Courant之目錄)、教廷圖書館(根據Pelliot之目錄)以及蘇俄列寧格勒Institut Vostokovedeniia圖書館的相關中文館藏, 整合成*Preliminary Checklist of Christian and Western Material in Chinese in Three Major Collections* (Hamburg, Germany: C. Bell Verlag)一書, 此書可說是目前欲了解歐洲這類收藏最實用的一本目錄, 所列文獻總數約為八百多種, 少部分與基督新教相關。此一書目包含兩部分, 分別依照書名和作者的字母順序排列, 但除此之外, 僅附記藏書號, 尤其不便的是, 書中未附中文的作者名和書名。

美國舊金山大學的陳綸緒(Albert Chan)神父, 則正針對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的約六百種中文相關文獻, 編纂一本較詳盡的目錄, 書中還將簡介各文獻的重要內容。此書問世之後, 想必將對明末清初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有極大助益。

五、未來研究的展望

此一領域雖然現仍留存豐富的原始文獻, 但其中多數均不易得見, 且亦不曾被學界研究過。方豪嘗為文介紹並協助重刊部分較罕見的原典, 是迄今對中國天主教史文獻學貢獻最大的學者, 此類整理和

⁵⁰François de Gandt,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n Chine, dans les archives romain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unpublished paper.

公開文獻的工作，亟需史學工作者繼續投入⁵¹，以幫助開拓並植深有關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課題與內涵。

今後我們除應繼續前輩學者對個別人物生平事跡的研究之外，似亦應從傳記式的史事鋪陳中走出來，嘗試對西學東漸在社會所產生的反響，進行一較全面且深入的探討。至於文獻方面，除應儘可能去掌握與天主教史直接相關的原典(多藏於歐洲)外，更應充分發揮中國學者的優勢，努力爬梳浩瀚的中文史料和詩文別集，透過這類零散的材料，我們或許更有機會能對中國士大夫接觸西學、西教的管道，有一深入的體認，也能對奉教人士如何藉由師友、親戚或同年、同鄉、同志等關係，以拓展西學西教的影響面，有一確切的理解。

此外，相關語文(如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英文、荷蘭文等)的閱讀能力尤需加強，我們也應嘗試將研究的視野打開，不要將目光自我拘限在中國或耶穌會，不僅有必要去理解並探討當時世界的政經局勢和教會的內部生態，對天主教傳華所產生的影響，對朱謙之在其《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一書中所開創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應努力承續，以調整先前的偏頗，而能更進一步對當時中、歐文明所出現的雙向交流有一較全面的掌握。

⁵¹ 孟德衛等學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雜誌》上，曾發表過數篇介紹各圖書館相關收藏的文章。筆者先前亦曾在《書目季刊》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等期刊上撰寫過數篇介紹此類文獻的論文。

A Review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Yi-lo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can contribute not only to a clear picture of the Ming-Ch'ing cataclysm, but also to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resulted from the contact of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in this field with emphasis on studies by Chinese historians. Introduc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related original materials and discussion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included.

Keyword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Historiography